

日本汉学史

第三部 转折和发展 (1945—1971)

◎ 李庆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本漢學史

第三部 转折和发展 (1945—1971)

清園



◎ 李庆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学史. 第3部, 转折和发展: 1945~1971/
李庆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723-0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汉学—历史—日本—
1945~1971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617号

出版策划 李伟国

责任编辑 许仲毅 曹勇庆

助理编辑 周珍 田芳园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技术编辑 伍贻晴

日本汉学史

——第三部 转折和发展(1945-1971)

李庆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76 插页 30 字数 2,991,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723-0/K·1747

定价 600.00元

(全五册)

第三部说明

本书是笔者所撰《日本汉学史》的第三部，论述的是 1946—1971 年日本汉学的历史。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曾分别于 2002 年、2004 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关于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撰写体例、出版经过等有关问题，笔者在本书的《前言》(见第一部)和本书的《后记》中，已经有所论说。原来设想是三部曲一起出版，读者自然就可以前后参见。但是，现在各部书分别单独出版，所以就有必要对第三部的相关问题再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1945 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的覆灭，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控制下进行了改造。日本的汉学也随着社会的变动，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出现新的发展。

首先，日本汉学研究的社会基础有了转变。旧日本帝国一朝崩溃，被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和战争强行推到后台的社会各种势力，又重新回到了舞台的前面；被压抑在地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烈火，冲涌而出。其次，就研究的内容而言，在战争中，为当时日本帝国侵略扩张政策服务、作为军国主义奴仆的糟粕被割弃，有价值的部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又长出了新的枝叶。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和西方学术交流的加强，出现了大量从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再次，研究人员也有所更替。新涌现出的人员中，有不少到过中国，有过战争的苦难经历，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具有沧桑感，显出深刻性。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的起飞，在日见丰厚的经济支撑下，日本的汉学研究向各个领域展开，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后一阶段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国际的冷战态势，自然也给这一时期的日本汉学打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鉴于上述的状况，笔者把 1945—1971 年间视为日本汉学转折和发展的时期。

从日本汉学的展开形态来看，最初是若干代表性的学者在传统的土壤上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其次是以东京和京都的帝国大学为支柱，成为专门的学科；再次，逐步扩展到各个旧帝国大学和私立大学。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旧帝国大学的改制、各地区出现的新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吸收了大量的研究力量，使原来占有“霸主”地位的帝国大学的学术地位发生动摇，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研究态势。因此，在这一

部中,笔者的论述也从注重代表性人物向兼顾人物和地域的方向倾斜。

这一时期日本汉学突出的研究成果,有如下一些方面:

受到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成为汉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在各个领域中都有所反映,与此相关,社会经济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世界史研究的进展,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日见增多,考古学、东西交通史、中国边疆史、敦煌学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思想史和宗教研究的领域,从语言学、阐述论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基础概念、范畴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中国的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研究,抹去了政治色彩,显现出和以往不同的形态。佛教史研究,从前一时期的通史研究向断代史展开。道教研究和欧美有关的研究相呼应,日见精到。

中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进一步确定,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不同的文学领域,都涌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语学研究,脱出原来日本式“训读”的模式,开创了以现代读音为重点的现代汉语研究,音韵学、语言学史研究都展现了新局面。

作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研究基础的文献整理、工具书的编制,在有系统地进行。

对于这些堪称琳琅满目的成果和活跃在各个领域中的主要学者,笔者在这一部中作了介绍和论说。

鉴于这一时期综合性的、有系统的日本汉学史资料非常有限,本书所述,大多为笔者自己的调查和收集,限于主客观的条件,有所脱漏,在所难免。有些部分,本来可以更具体地论说而没有展开,只列出一个提纲或只有简单的说明。究其原因,有的是出于全书内容平衡考虑,不得不割爱省略,但大多是笔者虽然已知其人其事,手边却暂时没有详细的资料;一时搁下,想要以后再补。而到交稿时,却来不及补充。这在国内诸公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就我自己来说,却是深感其中甘苦。因为孤身一人,在海外从事这项工作,并没有任何外来的资金或人力支援。在进行时,尽管得到了不少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对于我来说,自己究竟有多少时间可以从事这项工作,这个项目究竟有多大数量,有怎样的难度,都是无法把握的未知数,有相当多的不安定因素。在不清楚自己的研究环境能否一直得以确保的情况下,只得努力先把最主要的和可以做的部分做起来。至于不得不为了这一研究而放弃的其他各种机会,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度过了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就像在地底下挖掘地道,终于可以看到前面亮光的时候,再回首以往,感到有的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展开,有的地方还应该精雕细琢,或不无缺憾,但在当初,也是不得已的。这种情况,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就可明白。我期待着读者的

理解。

日本汉学的研究如果进一步深入展开的话,当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只好看以后的机会了。一个人的精力和生命总是有限的,时代给予每一个人的机遇也是有限的。在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国门的数十万学子中,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本来就为数不多,而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更是微乎其微。在这少数人中,不少鉴于生活或其他原因,又自愿地或无奈地改从他业,也有朋友已经去世。回眸四顾,不堪茫然。至今在此领域坚持跋涉者,据我所见,委实无几。从这样的角度说,笔者扪心自问,或许向社会和自己的人生还算有所交代,或许也算有幸运之处了——现在聊作如此想罢。年轻的时候,读过清代诗人黄景仁的诗:“俏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当时虽知其意而未必深有其感,现在可以说有更深一层的感受了。

回顾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汉学发展的历程,由涓涓细流而渐成江河大川,这或许可以说明,在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断绝、延续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存在的理由。面向未来,展望世界,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能否扬弃自身的糟粕,焕发新生的活力,在人类文明之林中,放射出更璀璨的光辉呢?我想,这是大多数中华儿女的追求,也是笔者的寄托之所在。

李 庆

2005年10月,校毕第三部补书

目 录

第三部说明	1
第五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汉学的转折(1945—1960)	1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	1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	1
第二节 日本国内的情况和中日关系	2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汉学和对日本汉学的影响	7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汉学状况	7
第二节 日本汉学和世界汉学界的联系	17
第三章 1945—1960年间日本汉学概况	22
第一节 日本汉学综述	22
第二节 学制、研究团体和刊物概况	26
第四章 主要的研究成果概述	31
第一节 上古、秦汉时代的历史研究	3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和唐、五代的历史研究	44
第三节 宋、辽、金、元时代的历史研究	51
第四节 明清时代的历史研究	55
第五节 思想史和宗教研究	65
第六节 文学研究	79
第七节 古代中国语言学的研究	91
第五章 史学研究的主要学者	95
第一节 前田直典、仁井田陞和铃木俊	95
第二节 宫崎市定	110
第三节 贝冢茂树	122

第四节	历史地理的研究者 (青山定雄、森鹿三)	129
第五节	边疆史的研究者 (松田寿男、田村实造、前嶋信次)	138
第六节	其他的史学研究者 (岛邦男〈见语言文字〉、滨口重国、三岛一、森 克己、小林高四郎、安部健夫、岩村忍、鹭渊一等)	149
第六章	哲学、思想史和宗教研究的主要学者	167
第一节	东京大学的加藤常贤和阿部吉雄	167
第二节	东京地区的研究者之一 (内野熊一郎、小林信明、麓保孝)	172
第三节	东京地区的研究者之二 (栗田直躬、根本诚、铃木由次郎、山田统)	177
第四节	京都和关西的研究者 (重泽俊郎、木村英一)	186
第五节	中京地区的研究者 (大滨皓、佐藤匡玄)	194
第六节	北方的学者 (板野长八、竹内照夫、吉田贤抗)	201
第七节	南国的学者 (楠本正继、户田丰三郎)	208
第八节	其他的思想史研究者 (林秀一、藤泽诚、安冈正笃、增井经夫)	213
第九节	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 (冢本善隆、山崎宏等)	219
第十节	道教史的研究者福井康顺	231
第七章	中国文学的研究者	235
第一节	吉川幸次郎	235
第二节	仓石武四郎和小野忍	247
第三节	长泽规矩也	255

第四节	斯波六郎和九州的研究者 (滨一卫、仓光卯平)	262
第五节	其他的文学研究者 (藤野岩友、星川清孝、網祐次、大矢根文次郎、大野实之助、 斋藤响、市野泽寅雄、毛冢荣五郎、奥野信太郎、辛岛骁)	266
第八章	语言和艺术等领域的研究者	279
第一节	岛邦男	279
第二节	铃木直治和鸟居久靖	283
第三节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 (小林太市郎等)	287
第四节	中国书法史的研究者 (石桥启十郎、杉村勇造、西川宁)	296
第五节	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者 (田边尚雄、林谦三、泷辽一)	301
第六编	在冷战风云中前进(1961—1971)	312
第一章	1961—1971年间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	312
第一节	世界局势	312
第二节	日本的国内形势和中日关系	315
第二章	国际汉学和日本与国际汉学界的联系	318
第一节	国际汉学概况	318
第二节	日本汉学界和世界各国汉学界的联系	327
第三章	日本汉学概况	331
第一节	学制和社会学术组织	331
第二节	经济支撑下的研究多样化(研究经费和科研资助制度)	333
第三节	日本汉学研究的新特色	338
第四章	史学研究之一(研究概况)	341
第一节	上古和秦汉时代的研究	34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研究	353
第三节	五代、宋、元、明、清等时代的研究	365
第五章	史学研究之二(主要学者)	384
第一节	东京的周藤吉之、西嶋定生	384

第二节	京都、关西和名古屋的学者 (平中苓次、守屋美都雄、宇都宫清吉、内田吟风、佐伯富)	393
第三节	东北地区的史学家 (曾我部静雄、星斌夫)	409
第四节	九州地区的史学者 (池田末利〈见思想史〉、日野开三郎、矢野主税)	417
第五节	考古和边疆史的研究者 (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驹井和爱)	426
第六节	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史学研究者 (牧野巽、天野元之助等)	447
第七节	其他的史学研究者 (木村正雄、镰田重雄、市原亨吉、中岛敏、岛田正郎、青木富太郎、 爱宕松男、外山军治、藤井宏、栗林宣夫、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 ...	456
第六章	哲学、思想史和宗教的研究	473
第一节	哲学、思想史和宗教研究概况	473
第二节	东京的学者 (东京大学的赤冢忠、宇野精一、市川安司)	485
第三节	东京的其他学者 (西顺藏、渡边卓、镰田正、今井宇三郎、栗原圭介)	495
第四节	京都和关西的学者 (森三树三郎、村上嘉实、笠原仲二)	509
第五节	九州、中国地区的学者 (池田末利、冈田武彦、友枝龙太郎、山下静雄、平冈禎吉)	516
第六节	东北和北陆地区的学者 (山田琢、天野镇雄、穴泽辰雄)	527
第七节	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 (久须本文雄、横超慧日、牧田谛亮、长部和雄、小川贯一)	534
第八节	道教的研究者 (酒井忠夫、吉冈义丰、大渊忍尔)	543

第七章 中国文学研究	549
第一节 中国文学研究概况	549
第二节 京都大学的学者小川环树	554
第三节 平冈武夫和人矢义高	560
第四节 京都、大阪地区的其他学者 (增田清秀、高木正一、花房英树、松下忠、中田勇次郎〈见艺术史〉、 泽田瑞穗、增田涉、高桥和巳)	569
第五节 东京的文学研究者 (赤冢忠〈见思想史〉、松枝茂夫、千田九一、户田浩晓、 船津富彦、小川昭一)	581
第六节 九州、中国地区的学者 (目加田诚、松本雅明、中岛千秋、白木直也、仓田贞美)	588
第七节 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的学者 (武田泰淳、饭冢朗、八木泽元、内田道夫)	598
第八章 语言学和艺术史的研究	602
第一节 中国语言学研究概况	602
第二节 文字学的研究者白川静	604
第三节 音韵学和方言的研究者 (饭田利行、波多野太郎)	610
第四节 词汇、语法史的研究者 (太田辰夫、香坂顺一)	620
第五节 藤堂明保和其他语学研究者	624
第六节 美术和艺术史的研究者 (藤原楚水、中田勇次郎、长广敏雄等)	630
第九章 主要论争的问题	643
第一节 中国历史时期划分的争论	643
第二节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652
第三部后记	667

第五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汉学的转折 (1945—1960)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

1945年,经过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努力,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纳粹德国一朝覆灭,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统治土崩瓦解,远东的日本帝国最终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自1931年以来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受法西斯迫害和侵略的人民,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但是,胜利的欢笑,很快就被冷战的寒流冲散了。

战后,东欧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欧洲围绕着战后的利益分配,酝酿着新的大国纷争。1947年6月,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明确地公开了要“封堵”苏联的意图,同时,开始对西欧进行大规模的“马歇尔复兴援助”。与此同时,苏联也对东欧的社会主义化大力支持,在1949年,成立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互助会议”(СЭВ)。

1948年,围绕着德国问题,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发生尖锐对立,导致德国的分裂。结果,1949年4月,美国和西欧11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在反对共产主义、防备共产主义的名义下,由美国主导,1954年在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55年,在中近东组成了中央条约组织,在全世界构筑了反共网络。

与此相对抗,1948年9月,苏联宣布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并且于1955年和东欧7国组成华沙条约组织。

在亚洲大陆，中国燃起了新的内战烽烟，1949年在战火中崛起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爆发了朝鲜半岛的战争，使一些人士产生了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忧虑。1953年，经过3年的战争，在板门店签订了南北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的停战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风潮开始涌起。

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各自独立。

1948年，因以色列的成立，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

1951年，伊朗宣布石油国有化。

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

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果，缔结了日内瓦协议，越南南北以北纬17度线为界，停战。

1955年，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努力下，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确认了中国和印度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了《万隆宣言》。

整个世界处于新的动荡之中。

1957年，匈牙利事变，表明了苏联对于东欧势力范围的立场。同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更向全世界显示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对抗。整个世界处于明显的对立和冷战的架构中。

1958年，由于美国派遣军舰介入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整个局面呈现紧张之势。

1960年，日本的岸信介内阁和美国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从法律上明确了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第二节 日本国内的状况和中日关系

一、日本国内的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明治维

新”以来的又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一) 政治方面

1946年,在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主导下,经过日本帝国议会的审议,于11月3日公布新的《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

同时,对于在战争中犯有罪行的人员,加以逮捕审判或开除公职。和战争有关的是对天皇制度的论争,有所谓的“国体护持运动”。日本处于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统治下,开始推行“民主化”,进行议会制的选举,实施政党政治。随着日本战后“新宪法”的制定(1946年11月3日)和实施(1947年5月3日),战争体制的解体和民主政治的确立在切实地进行。

1951年9月,美英等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战争问题告一段落。

此后,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完全朝美国“一边倒”,在战争中,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工场”。(见井上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世界》,《岩波世界历史》21卷248页)

由于开放了政党政治,日本保守系的民主党、自由党,逐步统一为自由民主党,成为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大党,从1955年开始一直单独执掌着日本的政权。同时,以劳工运动为基础的政治力量,形成了反对派的社会党,再加上在战后得以公开活动的共产党,日本的政党政治基本形成。这就是后来所谓的“55年”体制。

在美苏的世界性对峙中,日本岸信介的自民党政府采取和美国同步的方针,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而围绕着这一条约,日本国内左右两翼的对立明显加剧。

日本的政治,到达了战后的一个转折点。

(二) 经济方面

在经济上,战后的几年间,日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占领军司令部的主持下,对旧日本财阀进行解体,在农村中,实行土地改革,重新构筑新的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

日本的广大民众,生活状况处于非常艰难的阶段,“东京粮食事件”就是这种困苦状态的反映。广大的日本人民,忍受着困苦,对遭受到严重打击的经济加以重建。

和欧洲的情况相似,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一定的经济援助。

1950年,日本制定了“外资法”,吸收外国资本。由于日本本身的产业结构特点(比如,集团性,中小企业多,灵活机动,日本的劳动力较便宜,注重实用性的技术开发,等

等),再加上朝鲜战争,日本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获得了大批的定单。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日本的经济在十多年间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据统计,到1960年底,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工业所占比重已达到4.8%,恢复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的水平。

从1955年起,以合成纤维和石油化工产业的设备投资、国内家用电器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为支柱,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快速发展。

(三) 思想和文化方面

由于民主化的开展,各种思想得以在社会上公开发表,申述自己存在的理由,表明自己的理念。

全面西化是当时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西方的电影、音乐,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当时的占领军一起,进入了日本列岛,使日本人得以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这一切。在日本特别是城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知识界里,又出现了新的主张废除汉字、日本文字“罗马字”化的思潮。教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依旧存在。虽然占领军采取了较强硬的取缔政策,但在社会的深层,尤其是在一些和旧日本帝国有关的人士中,对战争失败的哀叹,对“大日本帝国”亡魂的追念之情,仍然存在。

更多的是在战争中受到灾难的人们对天身体制和军国主义的批判。在战时被压抑着的愤慨,喷发了出来,表现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追求和平的力量。

总之,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变得多样化了,变得活跃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出版物种类的明显增多。以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新书》的种数而言,1941年到1945年出版总数只有19种,但从1949年到1954年为225种,1955年到1960年为178种。(见《岩波新书50年》后所附目录,1988年再版)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一个更重要的现象,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本人的社会意识、生活意识、人的生存价值观,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发生了所谓的“意识革命”。(见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26卷236页)这对于日本的汉学研究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二、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又如何呢?

受到战后冷战结构和日本政局的制约,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战后这一时期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

首先是日本和中国缔结和平协定的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集团退据台湾继续所谓“中华民国”。紧接着是1951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府采取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予承认,并实际上参与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所以,在官方水平上,日本只和台湾当局保持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处于完全断绝的状态。

1952年,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讲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不予承认。这样,两者处于完全的对立状态。

同时,中日友好的力量也在聚集和展开。

1950年,成立了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经济界的人士也组成了日中贸易的促进团体。虽说,日本的这些友好团体遭受到美国占领军、日本当局的镇压,但中日友好交往的潮流在两国人民实际利益的支持下不断扩大。中日之间的贸易,以“民间”的方式渐渐开展。(参见古川万太郎《战后日中关系史》第2、3章,原书房,1988年修订本)

1952年开始,在中日两国友好力量的努力下,实现了3万名因战争原因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的遣返。(具体情况,参见1992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所载《中日友好难忘的史话》,又古川万太郎上引书。)同时,在日本的一些华侨和战争中被强制作苦力运到日本的劳工遗骨等,也送回了中国。(古川万太郎《战后日中关系史》66页)

1953年,周恩来总理会见了访问中国的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的大山郁夫委员长。

1954年9月,以日本财经界和政界的重量级人物田村省藏、石桥湛山、高崎达之助等创立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以促进对中国的经济交往。10月,日本超党派的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同月,中国的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员首次访问日本。

1954年11月,日本的鸠山内阁成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出现了和原来吉田茂政权的一些差异。

1955年3月,以雷任民(当时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为团长的中国民间贸易代表团访日。

1955年12月,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历史学代表团(一作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见古川万太郎前引书123页)访日。

此后的石桥湛山内阁基本上对中日友好的交流持支持态度。

1957年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社会党第一次访华团访问中国，和毛泽东主席会见，谈到了要恢复国家邦交的问题。

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在向前推进。

但是，1957年上台的岸信介内阁使这一势头受到严重挫折。

岸信介上台以后，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表示“不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一系列的发言，再加上1958年5月2日，在长崎发生的“中国国旗事件”（日中友协主办的中国产品展览会场，一反华人士降下中国国旗，而日本警察当局以“未加破坏”为由，不予处分，详见古川万太郎前引书153页以降），以及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发生的纠葛，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感。

1958年5月11日以后，中日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完全中止。中日之间的关系倒退到了1955年以前完全没有协定的状态。（见古川万太郎《战后日中关系史》157页）

为了打开局面，日本在野的社会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交涉的结果，中国方面提出了改善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即：1. 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行动；2. 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 不妨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恢复。（同上，165页）

但是，日本政府当时并不想恢复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原因是：1. 认为中国当时处于存在两个政府的状态；2. 经济上，不得不考虑台湾的因素，而且和中国的贸易也存在一些实际上的问题；3. 亚洲的政治态势是美国和中苏的全面对立，日本所处的地位是完全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所以，采取的是“政经分离”、“积累式推进”的政策。（见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26卷280—282页）

1959年，日本自民党的长老石桥湛山和松村谦三先后访问中国，和周恩来总理等会谈，以加强互相的了解，以图打开日本和中国间的僵局。

此后，由于日本国内围绕《日美安保条约》发生了左右两翼的激烈冲突，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一时退到了第二线。

中国和日本贸易关系、交流的再开展，是在《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中岸信介内阁下台以后。